

知覺父母衝突溝通模式對青少年生活適應的影響：探討衝突情緒調控策略的中介效果

吳志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葉光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何文澤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驗證親子衝突中，知覺父母採取的支持性與防衛性溝通模式對青少年生活適應(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身心症狀)的影響，並探討青少年採取不同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重新評估、壓抑、適當表達)的中介效果。經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分析 1,104 筆臺灣青少年(平均年齡 15.96 歲，標準差 0.35 歲；女性占 58.2%)所提供間隔約六個月跨兩個時間點的調查資料，結果顯示：(1)知覺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對青少年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有顯著正向效果；(2)知覺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對青少年親子關係滿意度有顯著負向效果、對身心症狀有顯著正向效果；(3)知覺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透過重新評估情緒調控策略，對整體生活滿意度具正向顯著的中介效果、對身心症狀具負向顯著的中介效果；(4)知覺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透過適當表達情緒調控策略，對親子關係滿意度與整體生活滿意度皆具正向顯著中介效果、對身心症狀具負向顯著的中介效果；(5)知覺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透過壓抑衝突情緒調控，對身心症狀具負向顯著的中介效果；以及(6)前述各項發現在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會有所差異。最後討論各項研究發現、限制與未來方向，以及可供實務工作者參考的建議。

關鍵詞：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青少年生活適應、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親子衝突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葉光輝，通訊方式：ykh01@gate.sinica.edu.tw。

壹、緒 論

該如何因應親子衝突？這對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來說往往是件棘手的挑戰。父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的衝突其實相當常見（Canary, Cupach, & Messman, 1995; Eisenberg, 1996; Steinberg, 1990），子女在青少年階段由於身心日益成熟而想要爭取更多的生活自主空間（Collins, 1990; Laursen & Collins, 2004），但是父母卻未必能夠事先準備好因應子女的這些轉變。一旦父母無法覺察、理解，並回應子女亟欲發展出成熟自主適應能力的期望，那麼親子間的衝突不僅會愈演愈烈，造成親子關係更趨緊張，對子女的身心適應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因此，許多親職教育模式（e.g., Dinkmeyer & McKay, 1989; Gordon, 1975; Ginott, 1965）都強調父母應採取傾聽、同理、尊重子女需求與情緒感受的支持性溝通模式，並且避免以拒絕、指責、威脅的防衛性溝通模式來因應與青少年子女之間的衝突。

然而，目前檢證父母衝突溝通模式影響青少年生活適應表現的實徵研究，卻較少深入探討其間的運作機制。爲了填補這項缺口，本研究援引社會學習理論中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 Bandura, 1962, 2000）的觀點，強調父母是子女情緒調控社會化的重要參考來源，而父母如何與子女溝通衝突的模式，更是子女習得管理衝突負向情緒的示範楷模。因此，本研究以臺灣青少年作爲研究對象，主張青少年知覺父母採取支持性與防衛性的衝突溝通模式，將會透過青少年依此習得的不同衝突情緒管理策略，進而影響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以及抑鬱、焦慮、壓力等身心症狀。

一、親子衝突中的支持性／防衛性溝通

親子衝突指的是子女與父母之間由於目標、意見，或價值觀不一致，導致一方妨礙或牴觸另一方的對立現象（Hall, 1987）。即便衝突往往被視爲親子關係品質的負向指標（e.g., Yeh, 2011; Yeh, Tsao, & Chen, 2010），但也有研究指出愈是親密、相互依賴的人際關係，愈無可避免地會發生較多的衝突（Geist & Gilbert, 1996）。人際之間的對立衝突主要牽涉兩項人類的基本需求：「個體化

／獨立」與「關係連結／依附」（Rahim & Bonoma, 1979; 葉光輝，1997）；尤其是在家人關係中，愈重視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愈希望可以在這兩項基本需求之間取得平衡（Teyber & McClure, 2011），但是這並不容易，因此個體該如何消解與家人之間的衝突更顯重要。另一方面，若以生命發展階段檢視，青少年時期正是個體發展出健康成熟自主性的重要時期（Loevinger, 1976; Noom, Dekovic, & Meeus, 1999），許多親子衝突即便在表象內容上各有不同，但其深層的原因多可歸咎於青少年子女想要向父母爭取更多個體化的自主空間（Pinquart & Srugies, 1998; Yau & Smetana, 1996; 葉光輝，2012），對個體化自主的渴求益加突顯親子雙方能否妥善因應彼此之間衝突的重要性。

既然衝突是青少年與父母之間難以避免的課題，又是子女能否朝向健全發展的重要契機，與其消極地思考該如何減少衝突的頻率，不如採取主動的觀點，思考有哪些因應方式可以有效地管理親子衝突，並可促進衝突歷程導向建設性的結果。考量到華人家庭重視孝道文化，在親子衝突歷程中居於高位的父母會比居於劣勢地位的子女更具主導性（林文英、王震武，1995；黃光國，2009），更能透過自身的互動表現引導整個親子衝突朝向建設性或破壞性的結果發展。因此本研究特別關注父母與青少年子女出現親子衝突時所採取的衝突溝通模式，探究不同溝通模式將對青少年子女的生活適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許多經典的親職教育模式（e.g., Dinkmeyer & McKay, 1989; Gordon, 1975; Ginott, 1965），都建議當父母與子女互動時要能夠管理自己的情緒、積極聆聽子女需求且不輕易批判、接納雙方感受並專注於尋求共識、澄清彼此的情緒感受以及平等看待並尊重各自的想法等原則，強調透過這些支持性的溝通模式，青少年子女可以在個體化與關係連結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根據 Teyber 與 McClure（2011）的人際歷程取向治療（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psychotherapy）觀點，當親子雙方能夠學會尊重並且營造出能夠充分滿足彼此個體化與關係連結需求的溝通環境時，除了較不會出現抑鬱、焦慮、壓力等因遭受挫折時所衍生的身心症狀，並且對個人整體的生活適應及幸福感會有較正向的影響，另對親子之間的親密互動也會有促進關係連結與自在融通的適應效果。

相對地，這些親職教育模式（e.g., Dinkmeyer & McKay, 1989; Gordon, 1975; Ginott, 1965）都提醒父母與子女互動時應避免採用拒斥、指責、威脅等防衛性的溝通模式，像是貶抑子女、忽視子女的主張與感受、表現出不信任子女的態度、強勢地對子女的想法作出負面判斷（不論子女的想法是否有其道理）等。

當父母以這些防衛性溝通模式回應子女的需求，子女便形同被迫要在個體化與關係連結這兩種基本需求之間作出取捨，並容易出現如 Horney (1945) 所謂的順從取悅（放棄個體化）、對抗攻擊（放棄連結）、規避逃離（個體化與關係連結皆放棄）等缺乏人際衝突因應彈性的不良適應型態。根據 Teyber 與 McClure (2011) 的人際歷程取向治療觀點，這些偏頗的取捨不論是對個人的整體生活適應、身心健康，或是親子之間的關係品質都會造成危害。

近年來廣泛應用於親職教養研究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ci & Ryan, 2000, 2008)，同樣主張父母與子女互動時應盡可能做到連結（覺察、聆聽子女的想法與感受）、釋義（說明自己教養行為的重要性與意義）、鼓勵自主（提供子女自我決定的機會）等行為原則 (Joussement, Landry, & Koestner, 2008)。許多研究也證實支持性溝通的教養行為有益於子女的適應發展 (e.g., Miklikowska, Duriez, & Soenens, 2011; Wu, Guo, Hsieh, & Yeh, 2015; 葉光輝、吳志文、王敏衡, 2016)。像是 Wu 等人 (2015, study 2) 以 923 位的臺灣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三年的追蹤調查後發現父母支持性的親子互動表現不僅會作用在青少年的個體化適應指標（較高的幸福感與自我價值，較少的身心症狀），同時也作用於朝向關係連結的適應指標（較認同親子間自然情感互惠的孝道信念，較少的外化偏差行為）。葉光輝等人 (2016) 曾以 1,419 位臺灣青少年提供的兩波追蹤資料進行交叉延宕模式 (cross-lagged model) 分析，指出這類親子互動表現在控制第一年正、負向適應表現效果的前提下，仍能作用在青少年隔年測得的個體化適應指標（較高的幸福感與較少的焦慮傾向）及親子關係連結適應指標（較高的社交技巧與較少的外化偏差行為）。

自我決定理論的觀點也主張父母應避免透過引發子女罪惡感、孤立子女，或是對愛的抽離 (love withdrawal) 等手段，進而強迫子女必須以特定的方式思考、感受，以及行為 (Assor, Roth, & Deci, 2004; Joussement et al., 2008)。有實徵研究指出這類強調心理控制的防衛性互動模式與青少年憂鬱傾向與外化偏差行為等負向適應指標密切關聯 (e.g., Barber, 1996; 程景琳, 2017; 程景琳、陳仰虹, 2015)。程景琳 (2017) 分析 350 筆臺灣青少年的資料後指出：母親採取這類防衛性互動表現的傾向與青少年子女在心理適應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不良表現有正向關聯性。程景琳與陳仰虹 (2015) 曾針對 716 筆臺灣青少年的資料進行分析，並發現父母採取這類互動表現的傾向，將透過青少年子女的社交焦慮傾向進而影響其同儕間的人際關係品質。

綜上所述，青少年時期與父母之間的衝突雖然是具有高度張力的親子互動，但也是青少年在個體化自主與親子關係連結這兩種適應目標上獲得健全發展的契機。本研究想要了解在親子衝突情境中父母採取的不同溝通模式，是否會影響青少年子女的個體化適應表現與關係連結適應表現。個體化適應表現以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身心症狀（抑鬱、焦慮、壓力）測量之；關係連結則以親子關係滿意度測量之。並具體假設：父母較常採取支持性的衝突溝通模式，青少年子女會有較高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較少的身心症狀（假設 1）；相對地，父母較常採取防衛性的衝突溝通模式，青少年子女會有較差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較多的身心症狀（假設 2）。

二、親子衝突中的不同情緒調控策略

除了驗證父母採取的衝突溝通對青少年子女生活適應的作用效果，本研究也想深入探討其間的細部運作機制。根據社會學習論學者 Bandura（1962, 2000）提出的觀察學習觀點，個體在人際互動情境中可以透過觀察楷模的行為表現與其後果，學習並獲得新的行為模式。必須強調的是，個體不僅是從楷模身上習得特定的行為，也會藉由揣摩楷模的內在狀態，理解並整合出自己應該如何控制管理該行為表現的認知、情緒處理歷程。換言之，父母採取的衝突溝通模式不僅會影響親子衝突歷程的發展，子女也能夠透過觀察學習父母行為背後的運作機制，形塑並習得將來可用於親子衝突（或其他相似人際衝突）的因應行為模式。

在各種可以透過觀察父母衝突溝通表現而習得的行為模式中，本研究基於三項原因特別關注在青少年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首先，親子衝突經常伴隨著負面的情緒經驗，像是氣憤、怨懟、委屈等（e.g., Yeh, 2011; Yeh et al., 2010），而在衝突的過程中親子雙方如何溝通管理這些負面的情緒，將是影響親子衝突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Cupach & Olson, 2006; Jobe-Shields, Buckholdt, Parra, & Tillery, 2014）。其次，研究指出青少年是否具備有效管理自身情緒的能力，或是傾向採取何種情緒調控的策略，對於提升（或危害）其生活適應表現都扮演著重要影響角色（e.g., Liu, Chen, & Tu, 2017; Liu, Wang, & Lu, 2013）。最後，許多資料也顯示家庭生活是決定青少年情緒調控表現的主要因素，並且主張青少年情緒調控策略的社會化或發展，正是落實在親子間的具體互動中（e.g.,

Buckholdt, Parra, & Jobe-Shields, 2014; Miller-Slough & Dunsmore, 2016)。

本研究將聚焦探討重新評估 (reappraisal)、壓抑 (suppression)，以及適當表達等三種親子衝突情緒調控策略。前兩者在情緒調控的研究領域中已被廣泛地討論 (e.g., 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2010; Dryman & Heimberg, 2018; Webb, Miles, & Sheeran, 2012)；後者則是近年來學者採用本土心理學取向、貼近華人家庭中親子實際互動情形，並且呼應情緒精鍊 (emotion refinement; Frijda & Sundararajan, 2007) 理論觀點所建構出的一種情緒調控策略 (何文澤、葉光輝、呂婕、Sundararajan, 2017)。

首先介紹重新評估與壓抑，兩者除了都是個體在面對負向情緒刺激時相當常見的情緒調控策略，它們同時分別對應於 Gross (1998, 2007) 所提出情緒調控歷程模型中前因焦點 (antecedent-focused) 與反應焦點 (response-focused) 的調控策略。前因焦點調控策略，指的是個人會專注在與情緒事件相關的脈絡特徵上，藉此來防止負面情緒的產生或是改變將產生的情緒感受。而重新評估即是其中一種具代表性的前因式焦點情緒調控策略，是個體透過調整自己看待負向情緒事件的認知框架，進而達成防止負面情緒或甚至產生正面情緒感受的適應目標 (Gross & John, 2003; Ray, Wilhelm, & Gross, 2008)。舉例來說，在親子衝突中，青少年子女可能會關注在父母出於愛護與擔心自己的考量，藉此調控原本衝突可能引發的氣憤、怨懟，或委屈等感受。

反應焦點的情緒調控策略則是個體不改變情緒本身，而是調整負面情緒產生的外在行為表現。壓抑便是十分典型的反應焦點調控策略，是個體刻意在外顯表現上隱藏自己當下情緒感受，使自己在表面上並沒有產生負面情緒。例如，當青少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發生衝突時，即便內心感到憤恨、怨懟，或是委屈，也只是強忍這些負面情緒，不會表現或表達出來，企圖藉由這樣的壓抑行為來調控自己當下的情緒狀態 (Gross & John, 2003; Sheppes & Meiran, 2007)。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重新評估能夠有效地排解、舒緩刺激所引發的負面情緒感受；相對地，採取壓抑的調控策略反而會導致個體出現較多影響身心適應的不良反應。例如 Gross 與 John (2003) 針對 5 組調查樣本 (來自總計 1,483 位研究參與者提供的有效資料，平均年齡介於 18 至 20 歲) 進行一系列的分析，結果指出重新評估策略不僅與個體化的適應指標有正向關聯 (較多正向情緒經驗與較少負向情緒經驗、較低度的憂鬱傾向，以及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自我價值，以及主觀幸福感) 也與關係連結的適應指標有正向關聯 (在人際互動中有

較多正向情緒表現與較少負向情緒表現、較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緒感受，以及較受人歡迎與喜愛）；然而相反的，壓抑策略卻是與個體化適應指標之間有著負向關聯（較少正向情緒經驗與較多負向情緒經驗、較高度的憂鬱傾向，以及較低的生活滿意度、自我價值，以及主觀幸福感），並且也與關係連結適應指標有著負向關聯（在人際互動中有較少的正向情緒表現、較排斥與他人分享自己情緒，以及自覺擁有較少的社會支持資源）。Aldao 等人（2010）針對 114 篇探討情緒調控策略與精神疾患症狀的研究論文進行後設分析，結果指出重新評估策略與焦慮（邊緣顯著）、憂鬱有著負向的關聯性；壓抑策略則是與焦慮、憂鬱，以及飲食疾患症狀都有正向的關聯。Webb 等人（2012）則關注一般研究對象（非疾患患者）採用各種情緒調控策略的成效，針對 306 個實驗結果進行後設分析得到的結果顯示：重新評估是較能有效調控負向情緒的策略。Fergus 與 Bardeen（2016）進行了兩項研究分別針對 465 筆與 439 筆成年人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結果指出壓抑策略會與憂鬱傾向有正向關聯。

其次，不同於重新評估與壓抑策略強調直接且立即的調控負面事件引發的情緒感受，適當表達（proper voicing）則是一種將情緒進行精鍊的調控策略。Frijda 與 Sundararajan（2007）在剖析華人古代哲學與詩詞中對於情緒的描述後，提出了「情緒精鍊」的概念，主張華人文化鼓勵個體在面對情緒事件時，應先收斂個人的情緒感受，品味這項情緒經驗，藉以達成內在情境狀態的和諧與人際互動狀態的和諧為適應目標。像是《中庸》裡「致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接中節，謂之和）」，或是「內修自省」與「反求諸己」等華人社會中的文化底蘊皆與這種將個人情緒精鍊的表現相互呼應。適當表達策略即是一種符合情緒精鍊觀點且適用於華人親子衝突情境的情緒調控策略，指的是子女會先策略性地抑制因親子衝突所衍生的氣憤、怨懟、委屈等負面情緒，接著透過品味與反思揉合這些負面情緒以達成個體內在狀態的和諧，再來審慎等待或是主動引發適當的時機與方式向父母表達自身的情緒經驗感受，藉此促進親子互動狀態與關係的和諧（何文澤等人，2017）。

何文澤等人（2017）並且比較適當表達與 Gross（1998, 2007）提出的重新評估策略，雖然兩者都涉及個體對於情境脈絡的深度理解，但是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重新評估策略未必會導向親子之間的外顯情緒表達，然而適當表達策略強調個體會在經過沉潛、品味、反思等歷程後，適時適切地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藉以求取親子互動關係的融通與和諧。適當表達也不同于壓抑策略，雖

然兩者都涉及了潛抑負面情緒的表現，但是壓抑是以消弭負面情緒感受為目的，然而適當表達卻是強調個體應當不偏倚地認識這些負面情緒感受，將之淬鍊昇華為個體求取內在狀態和諧與人際互動和諧的基礎。何文澤等人（2017）並分析了 761 筆青少年的有效資料，同步納入三種情緒調控策略的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果顯示：重新評估只對個體身心適應（生活滿意度與個人幸福感）有正向作用效果；適當表達不僅對個體身心適應有正向作用效果，對親子關係滿意度也具有正向的作用效果；至於壓抑，只有在母女衝突的情境中對個體身心適應有著負向的作用效果。這些發現一方面顯示出適當表達有別於重新評估與壓抑策略，另一方面也突顯出適當表達在華人親子衝突中是相對優於重新評估與壓抑的情緒調控策略。

再來細究父母衝突溝通模式、子女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以及個體化適應指標與親子關係連結適應指標的中介歷程。本研究認為在親子衝突的互動歷程中，即便負面的情緒在所難免，但是父母若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緩和子女的情緒波動、主動聆聽並鼓勵子女表達自己的內在經驗感受，以及積極尋求彼此之間的共識，這些支持性的衝突溝通表現猶如向子女示範親子之間的衝突其實是具有功能性的，衝突是一個契機讓雙方更加認識瞭解彼此的需求、想法，以及感受，而這有助於子女採取重新評估的情緒調控策略，將注意力關注在重述、重構衝突情境的脈絡特徵，調控自己看待親子衝突的認知框架，來達成防止負面情緒的產生，甚至從中引發正面情緒的產生。支持性的衝突溝通也有益於子女傾向採取適當表達的情緒調控策略，能夠檢視當下的情緒經驗、不偏倚地品味與省思情緒感受與內在狀態之間的和諧，並營造相互平等尊重的時機與氣氛進行充分溝通。青少年子女若是習得愈成熟的重新評估與適當表達情緒調控策略，愈能有較好的個體化適應表現與親子關係連結適應表現。相對地，若是父母採取防衛性衝突溝通模式，透過拒斥子女的需求感受、貶抑子女的想法信念、指責並威脅子女不應與自己有立場不一致等溝通方式，就像是在傳達衝突是一種災難的訊息，它不僅會令人感到負面情緒，更會破壞及危害親子關係。子女愈是學得這樣的信念，愈會採取壓抑的情緒調控策略來否認、忽視衝突引發的負面情緒經驗與感受，但是這樣的調控策略反而會加劇負面情緒經驗對個體化與親子關係連結等適應表現造成的不良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具體提出假設：父母較常採取支持性的衝突溝通模式，將透過子女較常採取重新評估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促進青少年子女獲得

較好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較少的身心症狀（假設 3）；父母較常採取支持性的衝突溝通模式，將透過子女較常採取適當表達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促進青少年子女獲得較好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較少的身心症狀（假設 4）；以及，父母較常採取防衛性的衝突溝通模式，將透過子女較常採取壓抑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導致青少年子女出現較差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以及較多的身心症狀（假設 5）。

本研究在探討父母衝突溝通模式、子女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以及個體化與親子關係連結適應表現之間關係的同時，也將考量父子、父女、母子，以及母女這四種親子對偶關係對這些關係的影響。既有文獻指出，父母的性別對親子之間的情緒互動有不同的影響，像是母親不僅較能覺察、回應子女的情緒經驗，也較常鼓勵與接納子女表達自己的情緒經驗，而父親卻比較會忽視或是貶抑子女的情緒經驗（e.g., Hunter et al., 2011）；在華人社會中父親通常是家中權威者的角色，而母親則是家中經營情感連結的主要角色（e.g., Chao & Tseng, 2002），這意味著母親對於子女情緒社會化有著較為正向的影響。至於子女的性別，既有研究也指出，相對於兒子，父母較傾向於與女兒分享彼此的情緒感受（e.g., Fivush, Brotman, Buckner, & Goodman, 2000），女性青少年也較常與人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而男性青少年則恰好相反，較不被鼓勵分享或表達出自己的情緒感受（e.g., Klimes-Dougan et al., 2007），這似乎意味著子女採用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對生活適應表現的影響可能會受到性別的影響。參考這些研究發現，本研究將細分出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四種親子關係深入探討父母衝突溝通模式、子女情緒調控策略，以及各項生活適應指標之間的路徑效果。

本研究參考過往研究（e.g., Barry, Frick, & Grafeman, 2008; Chen, Wu, & Yeh, 2016），指出子女知覺到的父母互動模式對於其生活適應，會比父母自己提供的資料更具有預測效果，再加上本研究強調青少年子女會透過觀察父母的衝突溝通模式而習得情緒調控策略，因此將以自陳式（self-report）量表測量青少年知覺父母採取的支持性與防衛性衝突溝通模式。只是如此一來各項研究變項均採自陳式量表測量，爲了降低本研究結果受到共同方法變異量威脅（common-method-variance bias）的影響，本研究參考 Podsakoff 等人（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所建議的時序間隔程序（temporal separation procedural）設計，在測量完青少年知覺父母衝突溝通模式的資料後，間隔六個月的時間再測量青少年的親子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與各項生活適應指標等資料。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施測流程

本研究採方便取樣，邀請就讀於臺北兩所高中職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間隔六個月共兩次的問卷調查填寫。因為受邀參與者都是未成年，所以本研究事先請監護人填寫知情同意書，告知研究目的並保證參與者提供的所有資料都會遵守匿名保密原則，參與者也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與或是中止參與。接著，再由受過學術倫理訓練的主試者前往該校進行問卷施測，主試者會將問卷發放給已取得監護人同意的高中職學生參與者，並且再次向這些學生說明本研究目的、確認匿名性與自由參與等權益後，請學生們開始填寫問卷。第一次的問卷請參與者評估與父親／母親發生親子衝突的頻率、知覺父親／母親的支持性衝突溝通與防衛性衝突溝通等量表；六個月後第二次的問卷則是請參與者評估自己與父親／母親發生衝突時，採取重新評估、壓抑，以及適當表達等衝突情緒調控策略的傾向，還有與父親／母親之間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以及抑鬱、焦慮、壓力等身心症狀等量表。本研究兩次問卷調查分別蒐集到 1,266 筆、1,139 筆資料，參與兩次問卷調查並且各個主要量表均填答完整的有效資料共有 1,104 筆，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請參考表 1。在這些有效資料中，因為問卷指導語皆有提醒參與者可以基於家庭、個人，或是其他任何因素，略過自己不方便回答的題目，所以參與者可依據個人意願選擇填寫父親版與／或母親版的量表，可以進行以父親、母親為互動對象之假設模型分析的有效資料分別計有 992 筆（女性 583 位）與 1,058 筆（女性 622 位），其中父親版與母親版量表皆完整填寫的資料共 876 筆。

表 1

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

	數量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642	58.2%		
男性	462	41.8%		
年齡			15.96	0.35
父親年齡			47.74	5.22
母親年齡			44.77	4.96
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202	18.3%		
高中或高職	541	49.0%		
專科或大學	317	28.7%		
研究所或以上	44	4.0%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180	16.3%		
高中或高職	584	52.9%		
專科或大學	322	29.2%		
研究所或以上	18	1.6%		
父母婚姻狀態				
已婚同居	865	78.4%		
已婚分居	35	3.2%		
離婚	162	14.7%		
喪偶	36	3.3%		
其他	6	0.5%		
是否與父親同住				
是	929	84.1%		
否	175	15.9%		
是否與母親同住				
是	1027	93.0%		
否	77	7.0%		

註：這些是進入正式分析的研究參與者於第一次調查時所提供的背景資料。

二、測量工具

各項構念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指標均呈現在表 2 與表 3。

（一）與父母發生親子衝突的頻率

本研究參考何穎秀（2014）發展的親子衝突頻率量表，請青少年參與者評估過去六個月內因為學校課業、做事方法、家務分擔、晚歸時間或門禁、使用電腦或網路、講電話或手機、結交朋友、個人隱私、對待家人方式、個人衛生習慣等 13 項生活事件與父親／母親發生意見不合或衝突的頻率。採 Likert 五點量尺，1 代表「從未如此」到 5 代表「總是如此」，中間的分數各自有相應的頻率程度。

（二）知覺父母支持性與防衛性衝突溝通

本研究使用吳志文、葉光輝（2012）發展的「知覺父母衝突溝通量表」，父親版與母親版量表分別用來評估青少年參與者在過去六個月內與父親及母親發生意見不合時，知覺到父親及母親採取的衝突溝通模式。支持性衝突溝通分量表包含 5 個題項，用來測量青少年知覺到父親／母親會以平靜、和緩、對等的態度，以及積極聆聽的方式與自己溝通彼此之間意見不合的程度；防衛性衝突溝通分量表也包含 5 個題項，用來測量青少年知覺到父親／母親會以脅迫、指責、怪罪的態度，以及訴諸權威方式要求自己放棄主張的程度。完整題項請參考附錄。該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尺，從「從未如此」至「總是如此」依序計為 1 至 5 分。

（三）親子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本研究採用何文澤等人（2017）的親子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量表，該量表依互動對象分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包含 14 個題項，其中有 10 個題項是將 Gross 與 John（2003）的情緒調控策略量表進行中文翻譯並且編修文句讓題項描述符合青少年與父母親發生親子衝突的情境。重新評估策略的分量表包含 6 個題項，用來測量青少年會以改變思維模式、重新調整看法等方式來調控自己在親子衝突事件中負面情緒經驗的程度（例題：我會改變對衝突事件的想法，讓自

己的心情變得比較愉快)；壓抑策略的分量表包含 4 個題項，用來測量青少年會以隱藏忍耐、不顯露出個人感受等方式來調控自己在親子衝突事件中負面情緒經驗的程度(例題：我會隱忍生氣或傷心的情緒，不讓它顯露出來)。最後的 4 個題項則是用來測量適當表達親子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評估青少年會以策略性抑制、品味、反思等方式來調控自己在親子衝突事件中負面情緒經驗，並且選擇適當的時機與適當的方式將負面情緒向父親／母親表達的程度(例題：我會選擇適當的措辭與爸爸／媽媽分享自己的情緒)。該量表採用 Likert 六點量尺，從「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依序計為 1 至 6 分。完整題目可參考何文澤等人(2017)的文章。

(四) 親子關係滿意度

本研究使用親子關係滿意度量表，評估青少年針對過去六個月內自己與父親、母親之間親子互動關係品質感到滿意的程度。該量表是由吳志文、葉光輝與王郁琮(2019)參考郭孝貞(1989)發展給成年父母填寫的親子關係滿意度量表，並且將題項內容調整成適合青少年子女填寫的描述方式。本量表分為父親版與母親版，各有 6 個題項，其中有 4 個正面陳述句的題項(例題：我與爸爸／媽媽相處時心情很輕鬆)與 2 個負面陳述句的題項(例題：我與爸爸／媽媽的相處充滿困難與挫折)。這個量表採用 Likert 六點量尺，1 代表「完全不符合」而 6 代表「完全符合」，中間的分數各自有相應的符合程度。

(五) 整體生活滿意度

本研究採用 Diener 等人(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發展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並經由吳志文等人(2019)翻譯為適用於臺灣青少年作答的中文版本。請參與者評估過去六個月內自己對於個人整體生活狀態感到滿意的程度(例題：大致上，我目前的生活跟我理想的生活狀態相當接近)。採 Likert 六點量尺，1 代表「完全不符合」而 6 代表「完全符合」，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符合程度。

(六) 身心症狀

本研究採用抑鬱焦慮壓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

用來測量青少年參與者過去六個月內經驗到抑鬱、焦慮，以及壓力三種身心症狀的程度。該量表一開始由 Lovibond 與 Lovibond (1995) 所發展，以 42 個題項測量個體是否出現抑鬱、焦慮以及壓力等負向感受；後來由 Brown 等人 (Brown, Chorpita, Korotitsch, & Barlow, 1997) 發展出 21 題項的短版量表，每面向都包含 7 個題項 (抑鬱例題：我對任何事情都失去了熱情；焦慮例題：我感覺自己即將要陷入莫名的恐懼感；以及壓力例題：我感覺很難放鬆自己的心情)。本研究使用的是 Wu 等人 (2015) 翻譯為適合臺灣青少年作答的中文版本。採 Likert 四點量尺，從「不符合」至「總是符合」依序計為 1 至 4 分。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先以 SPSS 軟體進行各主要變項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兩兩相關係數等統計分析，接著使用 Mplus 軟體，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並且有五項額外的處置。首先，考慮到本研究關注的親子互動歷程會受到父子、父女、母子，以及母女四種不同親子對偶關係的影響，因此依據參與者性別，分別針對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各自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其次，本研究參考 Little 等人 (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 的建議，將超過六個題項的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與親子關係滿意度這兩個變項進行項目與構念間平衡的合併策略 (item-to-construct balance parceling strategy)，各自合併成三個觀察指標 (indicator)，並遵循著讓彼此之間的因素負荷量盡量接近的原則。而身心症狀這個變項則是因為本來就具有抑鬱、焦慮、壓力三個分量表，因此直接是以這三個分量表的得分做為觀察指標。第三，分析時本研究控制住參與者自評與父親／母親發生親子衝突的頻率的影響，並且將多項參與者背景資料納入分析模型做為控制變項，包含了子女年齡、父親／母親年齡、父親／母親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態，以及是否與父親／母親同住。

接著，本研究採用多種適配度指標評估假設模型與研究資料之間的適配度指標，並參考學者建議的可接受標準 (Hu & Bentler, 1999; Kline, 2016)，卡方自由度比值應小於 3；CFI、TLI 等係數應大於 .90；SRMR 係數與 RMSEA 係數應小於 .060。最後，透過 Mplus 軟體的語法，本研究以 Hayes 與 Preacher (2010) 建議的拔靴法取向 (bootstrapping method approach) 估算知覺父母衝突溝通模

式、子女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以及各項生活適應指標之間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Hayes 與 Preacher (2010) 主張以拔靴法取向估算的間接效果會比傳統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因果階段論取向 (causal step approach) 以及 Sobel (1982) 的係數乘積取向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approach) 更加可靠。

參、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

表 2 與表 3 分別列出了父親版資料與母親版資料的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平均數比較，以及變項兩兩間的相關係數。結果指出：男性參與者與父親衝突的頻率顯著高於女性參與者，但是兩性參與者與母親衝突的頻率則沒有顯著差異。女性參與者自評與母親的關係滿意度高於男性參與者，而與父親的關係滿意度未達顯著差異。此外，女性參與者自評身心症狀的程度也顯著高於男性參與者。而女性參與者自評的整體生活滿意度也在父親版資料與母親版資料中都顯著高於男性參與者。由於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有部分交集，因此無法採取嚴謹的統計分析比較父親版資料與母親版資料的平均數。

針對相關係數的部分：首先，四種親子關係資料均顯示親子衝突頻率與多個變項有顯著相關，因此在正式分析中會控制住此一變項的影響。其次，父母支持性、防衛性衝突溝通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並與六個月後的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及身心症狀之間的相關表現大致都符合本研究假設預期。第三，重新評估與適當表達兩種情緒調控策略與三項適應指標之間的相關表現大致都符合本研究假設預期；但壓抑情緒調控策略與這些適應指標之間的相關表現則在四種親子關係資料中較缺乏一致性。

表 2
父親版資料：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男性參與者		女性參與者		r-value	相關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 與父親衝突頻率	1.89	0.69	1.79	0.71	2.27*	.87	-.34**	.62**	-.19**	.00	-.19**	-.35**	-.28**	.29**
2. 知覺父親支持性衝突溝通	2.61	1.10	2.55	1.08	0.81	-.30**	.89	-.44**	.24**	-.01	.46**	.55**	.29**	-.14**
3. 知覺父親防衛性衝突溝通	2.00	1.08	1.89	1.01	1.65	.60**	-.43**	.89	-.18**	.01	-.27**	-.50**	-.28**	.30**
4.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4.03	1.01	4.07	1.01	-0.61	-.16**	.24**	-.11*	.89	.36**	.48**	.37**	.32**	-.19**
5.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3.53	1.23	3.51	1.22	0.23	.09	-.13**	.12*	.25**	.86	-.03	-.05	-.01	.12**
6.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3.49	1.12	3.51	1.12	-0.27	-.26**	.45**	-.27**	.54**	-.16**	.84	.59**	.40**	-.23**
7. 與父親關係滿意度	4.21	1.14	4.34	1.23	-1.74	-.46**	.47**	-.49**	.35**	-.12*	.54**	.93	.48**	-.29**
8. 整體生活滿意度	3.88	1.10	4.04	1.16	-2.31*	-.30**	.30**	-.22**	.43**	-.09	.43**	.43**	.92	-.35**
9. 身心狀況	1.63	0.51	1.70	0.53	-2.10*	.24**	-.14**	.23**	-.16**	.21**	-.22**	-.34**	-.41**	.92

註：男性參與者資料計 409 筆；女性參與者資料計 583 筆。相關係數矩陣中左下方為男性參與者資料、右上方為女性參與者資料，對角線數值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 $p < .05$ ；** $p < .01$ 。

表 3
母親版資料：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男性參與者			女性參與者			t-value	相關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 與母親衝突頻率	2.11	0.67	2.07	0.75	2.07	0.75	0.71	.85	-.30**	.59**	-.18**	.06	-.20**	-.45**	-.32**	.30**
2. 知覺母親支持性衝突溝通	2.73	1.05	2.75	1.08	2.75	1.08	-0.33	-.32**	.89	-.43**	.19**	-.07	.41**	.51**	.36**	-.10*
3. 知覺母親防衛性衝突溝通	2.15	1.03	2.04	1.04	2.04	1.04	1.68	.60**	-.46**	.88	-.12**	.12**	-.27**	-.55**	-.37**	.31**
4.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4.12	0.98	4.11	0.93	4.11	0.93	0.03	-.17**	.31**	-.18**	.88	.28**	.51**	.33**	.32**	-.19**
5.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3.55	1.24	3.53	1.18	3.53	1.18	0.25	-.01	-.06	-.02	.27**	.87	-.06	-.11**	-.11**	.17**
6.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3.69	1.06	3.81	1.06	3.81	1.06	-1.76	-.19**	.40**	-.22**	.54**	-.02	.84	.54**	.44**	-.17**
7. 與母親關係滿意度	4.45	1.00	4.70	1.05	4.70	1.05	-3.87**	-.48**	.46**	-.46**	.41**	-.03	.50**	.91	.57**	-.24**
8. 整體生活滿意度	3.88	1.09	4.02	1.18	4.02	1.18	-1.97*	-.33**	.29**	-.26**	.39**	-.09	.41**	.53**	.92	-.38**
9. 身心狀況	1.64	0.52	1.70	0.53	1.70	0.53	-2.01*	.29**	-.01	.18**	-.15**	.21**	-.09	-.29**	-.45**	.93

註：男性參與者資料計 436 筆；女性參與者資料計 622 筆。相關係數矩陣中左下方為男性參與者資料、右上方為女性參與者資料，對角線數值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 $p < .05$ ；** $p < .01$ 。

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表 4 摘要了本研究中依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男性與女性參與者資料區分出的四個結構方程模型的整體適配度指標，顯示假設模型與參與者資料之間具有可以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此外，圖 1 與圖 2 分別呈現了互動對象為父親、母親的假設模型分析結果，其中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都達到顯著水準。表 5 則彙整父子、父女、母子、母女所有路徑效果與中介路徑效果的結果。

首先進行知覺父母支持性與防衛性衝突溝通對各項生活適應指標的總效果檢驗，結果指出：知覺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對於親子關係滿意度的總效果在父子 (estimate = .34)、父女 (estimate = .44)、母子 (estimate = .34)、母女 (estimate = .34) 模型中都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ps < .001$)；同樣地，其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總效果在上述四種親子關係 (依序：estimate = .31; estimate = .19; estimate = .26; estimate = .25) 中都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ps < .001$)；其對身心症狀的總效果卻在四種親子關係資料中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雖然有一些前置變項 (父母衝突溝通模式) 與結果變項 (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身心症狀) 之間的關係未達顯著水準，但這並不代表前置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間不存在中介歷程變項。目前許多學者 (e.g., Mackinnon, Krull, & Lockwood, 2000; Zhao, Lynch, & Chen, 2010) 皆主張前置變項對效標變項的單純作用效果顯著，並非是檢證中介效果的必要條件。換言之，本研究依然可以檢證假設 3 至假設 5 的中介歷程。

至於父母的防衛性衝突溝通，結果指出：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總效果在父子 (estimate = -.25, $p < .001$)、父女 (estimate = -.32, $p < .001$)、母子 (estimate = -.17, $p = .018$)、母女 (estimate = -.33, $p < .001$) 模型中都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總效果在母女關係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 (estimate = -.17, $p = .009$)，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而對身心症狀的總效果在父女 (estimate = .26) 與母女模型 (estimate = .28) 中皆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ps < .001$)，在其餘父子、母子模型中則未達顯著水準。

表 4
父子、父女、母子、母女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的各項適配度指標

	父親版資料		母親版資料		適配度評估標準
	男性參與者資料 (n = 409)	女性參與者資料 (n = 583)	男性參與者資料 (n = 436)	女性參與者資料 (n = 622)	
χ^2	1177.95	1384.83	1277.91	1464.13	
df	580	580	580	580	
χ^2/df	2.03	2.39	2.20	2.52	< 3.00
CFI	.94	.94	.93	.94	> .90
TLI	.93	.93	.92	.93	> .90
RMSEA	.05	.05	.05	.05	< .06
SRMR	.05	.04	.05	.04	<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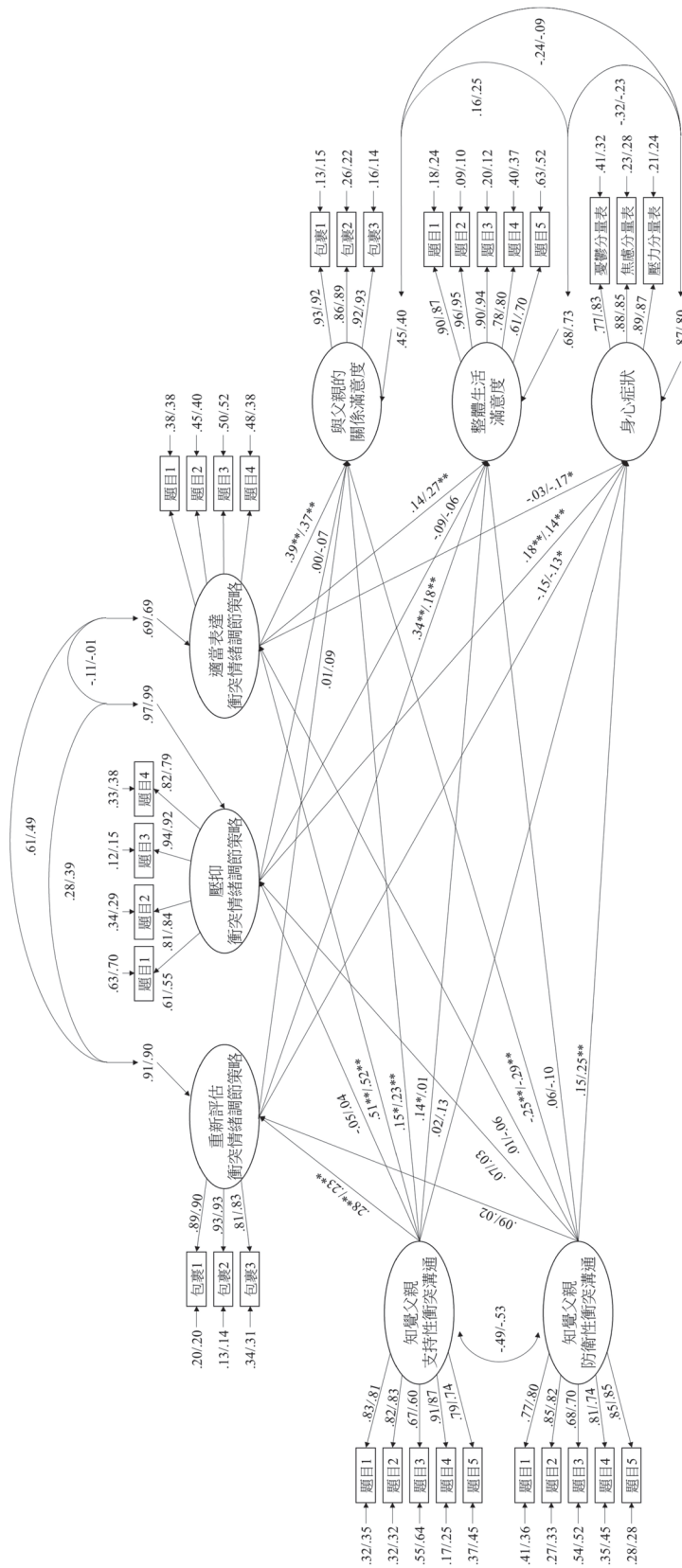


圖1 父親版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示意圖(斜線前為男性參與者資料數據, 斜線後為女性參與者資料數據)
註: 本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已同時納入參與者自評與父親發生親子衝突的頻率、子女年齡、父親年齡、父親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狀態, 以及是否與父親同住等控制變項的影響。* $p < .05$; ** $p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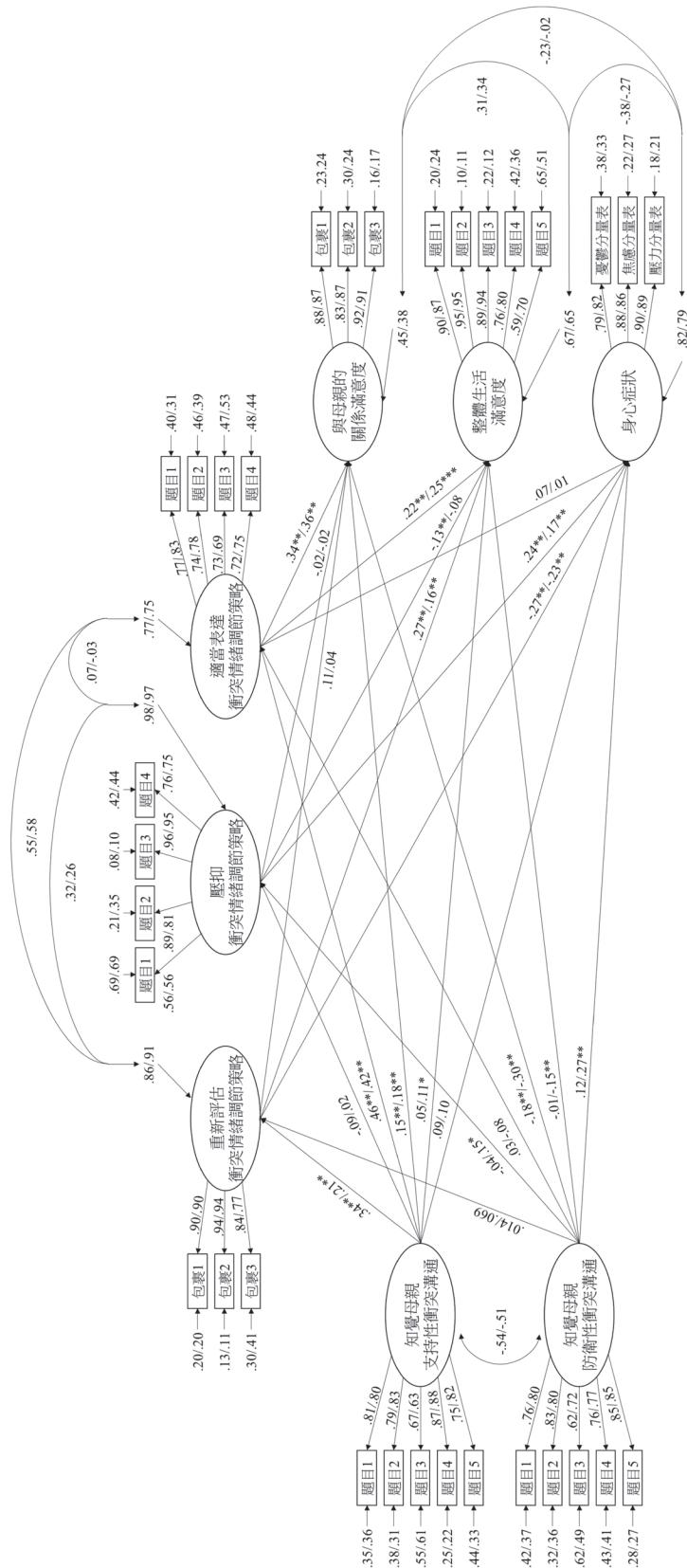


圖2 母親版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示意圖(斜線前為男性參與者資料數據,斜線後為女性參與者資料數據)

註:本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已同時納入參與者自評與母親發生親子衝突的頻率、子女年齡、母親年齡、母親教育程度、父母

婚姻狀態,以及是否與母親同住等控制變項的影響。* $p < .05$; ** $p < .01$ 。

表 5
彙整圖 1 與圖 2 分析模型中父子、父女、母子、母女資料各項路徑效果與中介路徑效果的結果

	與父/母親的關係滿意度				整體生活滿意度				身心症狀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路徑效果																								
知覺父/母親支持性衝突溝通	+	+	+	+	+			+					+	+	+	+	+				+	+	+	+
知覺父/母親防衛性衝突溝通	-	-	-	-				+				+								+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	+				-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	+	+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	+	+			+	+				-												
中介路徑效果																								
知覺父/母親支持性衝突溝通					+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	+																
知覺父/母親防衛性衝突溝通	+	+	+	+																				
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												

註：父子、父女指的是圖 1 模型中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母子、母女指的是圖 2 模型中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表示中介/路徑效果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表示中介/路徑效果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也將參與者年齡，還有父／母親的年齡、教育程度（1 = 國中或以下；2 = 高中或高職；3 = 專科或大學；4 = 研究所或以上）、婚姻狀態（1 = 已婚同住；0 = 其他），以及是否與父／母親同住（1 = 是；0 = 否）、與父／母親衝突頻率等設定為控制變項，結果指出：參與者年齡在父女資料中對重新評估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10; p = .032$ ），在母女資料中對親子關係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07; p = .018$ ）；母親年齡在母女資料中對壓抑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12; p = .004$ ）；父母婚姻狀態為已婚同住者相對於非已婚同住者，在父女資料中較傾向於採取重新評估（ $\gamma = .14; p = .013$ ）與適當表達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 $\gamma = .10; p = .040$ ），在母女資料中的有較高的親子關係滿意度（ $\gamma = .10; p = .003$ ）；與父／母親同住者相對於未同住者，在父女（ $\gamma = .14; p = .016$ ）、母女資料中有較高的整體生活滿意度（ $\gamma = .12; p = .015$ ），在母子資料中有較高的親子關係滿意度（ $\gamma = .12; p = .003$ ）與整體生活滿意度（ $\gamma = .12; p = .025$ ）；與父／母親衝突頻率在父女（ $\gamma = -.13; p = .036$ ）、母女資料中對重新評估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19; p = .001$ ），在父子（ $\gamma = -.17; p = .005$ ）、母子（ $\gamma = -.26; p < .001$ ）、母女資料中對親子關係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14; p < .001$ ），在父子（ $\gamma = -.17; p = .014$ ）、父女（ $\gamma = -.13; p = .036$ ）、母子（ $\gamma = -.22; p < .001$ ）、母女資料中對整體生活滿意度均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gamma = -.10; p = .048$ ），在父女（ $\gamma = -.14; p = .046$ ）、母子（ $\gamma = -.28; p < .001$ ）、母女資料中對身心症狀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 $\gamma = -.16; p = .003$ ）。

其次，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對重新評估的路徑效果在父子（ $\gamma = .28$ ）、父女（ $\gamma = .23$ ）、母子（ $\gamma = .34$ ），以及母女（ $\gamma = .21$ ）模型中均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ps < .001$ ）；對壓抑的路徑效果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都沒達到顯著水準；而對適當表達的路徑效果卻在這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依序： $\gamma = .51; \gamma = .52; \gamma = .46; \gamma = .42$ ）都為正向且達到顯著水準（ $ps < .001$ ）。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對重新評估、適當表達的路徑效果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都未達顯著水準；對壓抑的路徑效果則只有在母女模型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gamma = .15; p = .023$ ），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皆沒有達顯著水準。

接著，三種不同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對於各項生活適應指標的路徑效果也有所差異。重新評估對與父母親關係滿意度在父子、父女、母子，以及母女四種模型中的路徑效果皆未達顯著水準；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路徑效果則是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皆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依序： $\beta = .34, p < .001; \beta = .18, p$

$= .001; \beta = .27, p < .001; \beta = .16, p = .002$)；對身心症狀的路徑效果則除了父子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有達顯著水準的負向路徑效果（依序： $\beta = -.13, p = .030; \beta = -.27, p = .001; \beta = -.23, p < .001$ ）。壓抑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對於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路徑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路徑效果只在母子模型中具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beta = -.13, p = .004$ ），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則皆未達顯著水準；對身心症狀則是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具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依序： $\beta = .18, p = .003; \beta = .14, p = .003; \beta = .24, p < .001; \beta = .17, p < .001$ ）。適當表達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路徑效果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依序： $\beta = .39; \beta = .37; \beta = .34; \beta = .36; ps < .001$ ）；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路徑效果除了在父子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外，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有達顯著水準的正向路徑效果（依序： $\beta = .27, p < .001; \beta = .22, p = .001; \beta = .25, p < .001$ ）；對身心症狀則是只有在父女模型中具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 $\beta = -.17, p = .015$ ）。

最後呈現各項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知覺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透過重新評估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提升整體生活滿意度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在父子（estimate = .10, SE = .04, $p = .008$, 95% CI [.040, .182]）、父女（estimate = .04, SE = 0.02, $p = .041$, 95% CI [.010, .094]）、母子（estimate = .09, SE = 0.03, $p = .004$, 95% CI [.037, .161]），以及母女四種模型中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3, SE = 0.02, $p = .034$, 95% CI [.009, .074]）；進而降低身心症狀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則在母子（estimate = -.09, SE = 0.03, $p = .007$, 95% CI [-.168, -.035]）與母女模型中達到顯著水準（estimate = -.05, SE = .02, $p = .016$, 95% CI [-.097, -.017]），在父女模型中雖然以係數乘積取向估算得到的間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3, SE = 0.02, $p = .085$ ），但經由拔靴法取向估算得到較為穩定的間接效果卻有達到顯著水準（95% CI [-.076, -.003]），在父子模型中則是未達顯著水準。

父、母親支持性衝突溝通透過適當表達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提升親子關係滿意度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在父子（estimate = .20, SE = 0.06, $p < .001$, 95% CI [.099, .316]）、父女（estimate = .19, SE = 0.04, $p < .001$, 95% CI [.128, .279]）、母子（estimate = .16, SE = 0.04, $p < .001$, 95% CI [.088, .247]），以及母女四種模型中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5, SE = 0.03, $p < .001$, 95% CI [.098, .224]）；而提升整體生活滿意度的中介路徑則是除了在父子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外，在父女（estimate = .14, SE = 0.04, $p < .001$, 95% CI [.063, .235]）、母

子（estimate = .10, $SE = 0.04$, $p = .008$, 95% CI [.036, .188]），以及母女模型中都具有正向且達顯著水準的間接效果（estimate = .11, $SE = 0.03$, $p < .001$, 95% CI [.051, .173]）；而降低身心症狀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則是只在父女模型中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9, $SE = 0.04$, $p = .034$, 95% CI [-.177, -.016]），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

知覺父母親防衛性衝突溝通透過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提升身心症狀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雖然以係數乘積取向估算得到的間接效果在母女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2, $SE = .01$, $p = .087$ ），但經由拔靴法取向估算得到較為穩定的間接效果卻有達到顯著水準（95% CI [.003, .059]），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皆未達到顯著水準。除了前述各項中介路徑，其餘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都未達顯著水準。

肆、綜合討論

本研究假設均獲得部分支持。首先針對假設 1 與假設 2，父母的支持性衝突溝通模式對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度都有顯著且正向的總效果，符合許多經典親職教育模式（Dinkmeyer & McKay, 1989; Gordon, 1975; Ginott, 1965）的主張觀點，強調父母與子女發生衝突時應該以緩和、平等、接納等支持性的溝通原則，幫助雙方釐清且尊重彼此的情緒感受、想法，以及需求，並且避免採取拒斥、指責、脅迫等防衛性的溝通模式，較能促進青少年子女能夠兼得個體化與親子關係連結兩種發展適應目標。

本研究結果也突顯出「支持性衝突溝通模式」與「防衛性衝突溝通模式」各自具有其作用效果。四組親子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前者對於青少年子女的親子關係滿意度與整體生活滿意度皆具有正向的顯著效果，但後者卻只對親子關係滿意度具有負向的顯著效果，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效果未達顯著水準（母女模型除外）。換言之，父母親若只是消極地避免採取防衛性的衝突溝通模式，雖然可以緩減親子關係滿意度受到的負面影響，但卻未必能提升青少年子女的整體生活滿意度。這似乎說明了子女追求個體化獨立的自主適應發展是需要父母更為積極、主動的聆聽、理解，以及支持，單就只是避免消極的防衛性溝通仍無法真正促進子女朝向對自己個人整體生活狀態感到滿意

的親職角色目標。

至於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對身心症狀具負向效果的假設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未達顯著水準，這可能是因為抑鬱、焦慮，以及壓力等身心症狀反映比較屬於狀態性的指標，一方面父母支持性衝突溝通的效果無法持續影響間隔六個月後的身心狀態，二方面也是它們較為容易受到這六個月內發生的其他生活事件的混淆影響，所以導致該項總效果未能達到顯著的水準。父親與母親的防衛性衝突溝通對男性青少年身心症狀的總效果未達顯著水準可能也是相同的緣由。但是，值得注意與警惕的是，對女性青少年的身心症狀來說，父親與母親的防衛性衝突溝通卻有著相對穩定長久且達到顯著水準的總效果，代表著這類溝通模式對女性青少年的身心適應造成的危害相較於男性青少年較大。一方面可能是女性青少年更加在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形象，因此對於父母在親子衝突中所說出的貶抑、拒斥、加諸罪惡感、指責等溝通方式會感到特別受傷；另一方面，本研究由於採用的是量化設計的研究策略，所以無法確知父母在面對青少年時期的兒子與女兒時，所進行的防衛性衝突溝通在本質上是否有所差異，而這些具有不同本質的防衛性溝通有可能是造成這些傷害效果對女性青少年特別深刻的原因。這些假設性的解釋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釐清。

其次針對假設3與假設4，分析結果大抵上支持父母的支持性衝突溝通會透過重新評估與適當表達，進而影響青少年的各項生活適應表現。值得關注的是，除了父子模型外，依據父女、母子、母女模型的分析結果大抵上顯示出兩個與何文澤等人（2017）既有發現相近的型態：（1）父母的支持性溝通會透過重新評估，間接影響青少年子女的個體化適應指標（較高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較少的身心症狀）；以及（2）父母的支持性溝通會透過適當表達，間接影響青少年子女的正向適應指標（較高的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親子關係滿意度）。

若更進一步細究其中的歷程，圖1與圖2的分析結果顯示父母的支持性衝突溝通對於這兩種情緒調控策略都有正向且顯著的路徑效果。這結果符合本研究的主張，認為父母採取的支持性溝通若是能讓子女充分觀察習得，便能產生效仿的正向效果，展現在自己與父母發生衝突時採取較具適應功能性的情緒調控策略，一方面透過重新評估策略調整自己對於親子衝突事件的負面認知評估，改以正面的認知框架來重新詮釋親子之間的衝突互動，另一方面也可以透過適當表達策略來覺察、品味、省思自己因與父母發生衝突所產生的情緒感受，並以求取個人內在狀態的和諧與親子互動關係的和諧為目標，沉潛以待或

是主動誘發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向父母溝通討論自己的情緒經驗。

但圖 1 與圖 2 也顯示，重新評估只對整體生活滿意度與身心症狀（父子模型除外）具顯著的路徑效果、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而適當表達則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父子模型除外）、親子關係滿意度皆具有顯著的路徑效果，對身心症狀只有在父女模型中具顯著的路徑效果。這些結果不僅呼應了何文澤等人（2017）過往的研究結果，同時也突顯出重新評估與適當表達這兩種情緒調控策略在本質上的差異。重新評估策略著重在個人內在認知框架與情緒感受的調整，因此其適應性的效果主要展現在提升對於整體生活的滿意度，還有減少抑鬱、焦慮，以及壓力等危害身心健康的內化問題症狀；因為不像適當表達策略會進一步與父母針對衝突展開對話溝通，所以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促進效果表現便相對有限。適當表達策略由於兼顧個體內在狀態的和諧與親子互動關係的和諧，因此有益於提升青少年對於整體生活與親子關係的滿意度，但是在整個情緒調控的歷程中，並不是將衝突伴隨的負向情緒視如鯁刺必欲去之而後快，而是不偏倚地接納這是親子衝突歷程中無可避免的一部分，從中體會父母與自己雙方對於衝突事件的感受，所以研究結果顯示出適當表達策略沒有顯著抑制身心症狀的作用效果（父女模型除外）。

第三，針對假設 5 得到的結果進行討論，意料之外地知覺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透過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進而影響生活適應的間接效果，只有在母女模型中以身心症狀作為結果變項的中介路徑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各項中介路徑均未有顯著的間接效果。從圖 1 與圖 2 可以發現，這主要是因為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對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的路徑效果只有在母女模型中達顯著水準。本研究在推論時雖然主張青少年在觀察到父母採取防衛性的衝突溝通模式時，會習得衝突是一項破壞危害親子關係的威脅災難，因此會採用壓抑的情緒調控策略來否認隱忍，認為可以藉此避免衝突益發白熱化；但是，本研究可能忽略了青少年也會從中習得以責備、謾罵、爭奪權力，甚至是肢體攻擊等宣洩激烈衝突情緒的調控策略。因此，在缺少測量其他條件因素的情況下，本研究便無法有效確立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與壓抑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之間的觀察學習效果。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這項可能的解釋。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圖 1 與圖 2 的結果也顯示壓抑策略會與青少年的身心症狀有正向顯著的路徑效果，這符合過往探討情緒調控的實徵研究發現，指出：個體雖然是希望透過壓抑的策略來減少負面情緒感受，但反而卻會令自己

因為這些負面情緒經驗造成身心健康受到危害（e.g., Aldao et al., 2010; Fergus & Bardeen, 2016; Webb et al., 2012）。而壓抑策略對親子關係滿意度的作用效果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均未達顯著水準，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負面影響也只有在母子模型中達顯著水準，其餘三種親子關係模型中皆為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青少年採取壓抑負面情緒來因應親子衝突的表現，符合華人孝道文化中強調親子之間具有階級秩序的權威性有關（Ho, 1996; Yeh & Bedford, 2003），對部分的參與者來說，他們可能認為強制壓抑自己對於親子互動的不滿情緒，就是身為「好子女」、「好人」的具體表現（Hwang, 1999; Kwan, 2000），而使得壓抑情緒調控策略的負面影響不易顯示在親子關係與整體生活評估這類適應指標上。

第四，如前所述，本研究各項假設經由分析所獲得支持與否的結果，在四種親子關係模型中是有些分歧的。像是本研究提出的一些假設只有在母女模型中獲得支持，這可能是因為受到華人家庭中母女關係特有情結的影響（劉惠琴，2000），母親採取指責、拒斥、貶抑、賦予罪惡感等防衛性互動模式才能夠深刻地影響到女性青少年跨時六個月後的整體生活滿意度、更加傾向採取壓抑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以及進而加劇抑鬱、焦慮、壓力等身心症狀。相對地，在父子模型中有許多本研究提出的假設並未獲得支持，可能是因為華人父親的權威性角色（Chao & Tseng, 2002）與不鼓勵男性坦率進行情感互動的性別角色框架（Klimes-Dougan et al., 2007）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父子之間較缺少深厚的情感基礎，在父子之間發生衝突時，即便男性青少年採用重新評估的情緒調控策略仍無法有效緩減身心症狀，而採用適當表達的情緒調控策略也無法促進個人整體的生活滿意度。至於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對青少年子女身心症狀的正向總效果只有在父女與母女模型中獲得支持，顯示女性青少年較容易受到父母在親子衝突中採取指責、拒斥、貶抑、賦予罪惡感等防衛性溝通模式的影響而危害其身心健康。還有部分假設只有在父女、母子模型中獲得支持，像是適當表達策略對身心症狀的負向效果只在父女模型中獲得支持、壓抑對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負向效果只在母子模型中獲得支持，這些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則需要後續更多實徵資料確認其穩定性。

雖然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支持假設的實徵結果，但是這些結果仍需要更多研究進行重複驗證，底下提出三項本研究的限制與未來方向提供給後續的學者斟酌參考。首先，在同時估算三種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路徑效果的前提下，本研究也得到一些父母支持性與防衛性衝突溝通對於親子關係滿意度、整體生活滿意

度，以及身心症狀的直接路徑效果達到顯著水準（請見圖 1 與圖 2）。這顯示出除了青少年子女的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之外，在這整個歷程中仍有其他具有潛力的中介因素存在，像是青少年子女對於親子衝突本質的認知評估、採取不同衝突消解模式的傾向（可參考葉光輝，2012），後續學者可以將這些因素納入以精緻化整個親子衝突的建設性轉化歷程。

其次，雖然本研究有意檢視四種親子關係的影響，但是礙於資料結構有一定幅度的重疊因素，使得父子—母子，以及父女—母女，其得到結果的穩定性可能會有所膨脹。但是若將交集的樣本排除重新進行分析，又會導致樣本數過少，使得統計分析結果的穩定性同樣受到質疑。針對這項限制，本研究期望後續有更多研究可以以更大量、更具異質性與代表性的實徵資料進行重複驗證以強化本研究發現的穩定性。

第三，青少年在親子衝突中可以採用的情緒調控策略有很多，而本研究僅從中選取在過往討論中極具代表性的重新評估、壓抑，以及適當表達三種策略，因此得到的結果對於親子衝突歷程全貌的描寫仍相當有限。就如先前所述，本研究未將責備、謾罵、爭奪權力，甚至是肢體攻擊等宣洩情緒的調控策略納入，可能無法有效探討父母防衛性衝突溝通影響青少年生活適應的中介路徑。後續學者可以嘗試納入更多有討論價值的情緒調控策略進行重複的驗證。

第四，本研究雖然採取時序間隔程序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威脅的影響，但是衝突情緒調控策略與各項生活適應指標這兩類變項仍是在同一個時間點進行測量，使得這兩類變項之間的路徑效果仍有可能被高估。未來可以考慮採用其他不同的研究設計，例如長期追蹤調查或是經驗取樣法，透過更嚴謹控制共同方法變異程度的統計分析重複驗證本研究的發現。但是，也必須強調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父母衝突溝通模式與青少年子女衝突情緒調控策略之間的觀察學習歷程，而在跨時六個月的時序間隔設計下，本研究已嘗試適度排除掉部分共同方法變異的威脅，得到的結果仍可提供給相關領域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最後總結本研究：親子衝突不僅是青少年階段常見的現象，更是家庭生活中對親子雙方都具有適應功能性的挑戰任務，若是處理得宜，子女不僅可以滿足其朝向個體化的自主性發展需求，同時也能鞏固維繫親子間的親密關係連結。雖然「父母應該採取支持性溝通、避免防衛性溝通來因應與子女之間的衝突」已是老生常談，卻少有學者細究其間細緻的運作歷程。本研究爲了填補這項缺口，援引觀察學習的理論觀點作爲解釋的依據，強調青少年可以透過觀察

父母在親子衝突中的言行表現習得不同的情緒調控策略，進而影響青少年子女各項的生活適應表現。根據實徵資料的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父母在與子女溝通衝突時，若只是消極地避免採用防衛性的衝突溝通，僅會有緩減親子關係品質因衝突而惡化的效果，但是如果可以更為積極地採取支持性的衝突溝通，不僅能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還有益於提升個人的整體生活滿意度。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父母採取支持性衝突溝通對親子關係滿意度與整體生活滿意度的正向作用效果，主要會受到重新評估與適當表達這兩種情緒調控策略的中介影響。本研究期盼這樣的發現可以提供給家庭生活教育的實務工作者作為參考，教育家有青少年子女的家長可以發展出有效的支持性衝突溝通技巧，一方面讓子女認識當下的情緒感受（而不是壓抑）、理解親子雙方的情緒經驗，進而沉潛以待或是主動營造可以有效溝通衝突的適當時機與方法，另一方面幫助子女以正向的思維框架看待人際衝突、視衝突為促進提升人際互動的契機而非危機，進而消解自身負面的情緒感受。

參考文獻

- 何文澤、葉光輝、呂婕、Sundararajan（2017）。適當表達：親子衝突中的情緒精鍊。**本土心理學研究**，48，57-119。
- 何穎秀（2014）。青少年親子衝突解決效能對親子衝突頻率與親子關係滿意度的作用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
- 吳志文、葉光輝（2012年10月）。父母支持性溝通模式對子女衝突評估與生活適應的作用效果。「第51屆台灣心理學會暨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臺中市亞洲大學。
- 吳志文、葉光輝、王郁琮（2019）。「親子衝突因應策略量表」之信、效度研究。載於周玉慧、葉光輝、張仁和（主編），**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121-146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林文英、王震武（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3，2-92。
- 郭孝貞（1989）。父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與其幼兒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文化大學，臺北市。

- 程景琳（2017）。國小高年級學童所知覺之父母管教行為與心理社會適應之關聯。**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0**，161-188。
- 程景琳、陳虹仰（2015）。父親及母親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同儕受害的關聯：社交焦慮的中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6**（3），357-375。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臺北：心理出版社。
- 葉光輝（1997）。親子互動的困境與衝突及其因應方式：孝道觀點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2**，65-114。
- 葉光輝（2012）。青少年親子衝突歷程的建設性轉化：從研究觀點的轉換到理論架構的發展。**高雄行為科學學刊**，**3**，31-59。
- 葉光輝、吳志文、王敏衡（2016）。知覺滿足需求的教養與青少年的適應表現：雙元自主能力的跨時間中介效果檢驗。**本土心理學研究**，**45**，57-92。
- 劉惠琴（2000）。青少年在母女關係中的個體化模式。**中華心理衛生**，**12**（4），53-91。
-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 Schweizer, S. (2010).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 217–237. doi:10.1016/j.cpr.2009.11.004
- Assor, A., Roth, G., & Deci, E. L. (2004). The emotional costs of perceived parents' conditional regard: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47-89.
- Bandura, A. (1962). Social learning through imitation. In M. R. Jones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Bandura, A. (2000). Self-efficacy. In A. E. Kazdin (Ed.),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ber, B. (1996).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67*(6), 3296-3319.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
- Barry, C. T., Frick, P. J., & Grafeman, S. J. (2008). Child versus parents report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hild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Assessment*, *15*, 294-303.
- Brown, T.A., Chorpita, B.F., Korotitsch, W., & Barlow, D.H. (1997).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in clinical sampl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 79-89.

- Buckholdt, K. E., Parra, G. R., & Jobe-Shields, L. (2014).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through parental invalidation of emotions: Implications for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2), 324–332.
- Canary, D. J., Cupach, W. R., & Messman, S. J. (1995). *Relationship conflict: Conflict in parent-child, friendship,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ao, R., & Tseng, V. (2002). Parenting of Asian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pp. 59-93).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Chen, W. W., Wu, C. W., & Yeh, K. H. (2016). How parenting and filial piety influence happines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quality of family life in Taiwanese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2(1), 80-96.
- Collins, W. A. (1990).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nteraction,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R. Montemayor, G. R. Adams, & T. P. Gullotta (Eds.),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transitional period? Advances i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Vol. 2, pp. 85–106). Newbury Park, CA: Sage.
- Cupach, W. R., & Olson, L. N. (2006).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A lens for viewing family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D. O. Braithwaite & L. A. Baxter (Eds.), *Engaging theories in family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pp. 213–228). Newbury Park, CA: Sage.
-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 227-268.
- Deci, E. L., & Ryan, R. M. (2008). Facilitating optimal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cross life's domains. *Canadian Psychology*, 49(1), 14-23.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71-75.
- Dinkmeyer, D. C., & McKay, G. D. (1989). *The parent's handbook: STEP, 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 parenting*. Circle Pines, MN: American Guidance Service.
- Dryman, M. T., & Heimberg, R. G. (2018).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65, 17-42.

- Eisenberg, A. (1996). The conflicts talk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Patterns related to culture, SES, and gender of child.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2, 438-452.
- Fergus, T. A., & Bardeen, J. R. (2016).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appiness emotion goal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0, 23-27.
- Fivush, R., Brotman, M. A., Buckner, J. P., & Goodman, S. H.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 child emotion narratives. *Sex Roles*, 42, 233–253.
- Frijda, N. H., & Sundararajan, L. (2007). Emotion refinement: A theory inspired by Chinese poetic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227-241.
- Geist, R. L., & Gilbert, D. G. (1996). Correlates of expressed and felt emotion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process, and outco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1, 49-60.
- Ginott, H. G. (1965)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New York: Macmillan.
- Gordon, T. (1975). *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 The tested new way to raise responsible childre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ross, J. J. (1998). Antecedent-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224-237.
- Gross, J. J. (2007).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348-362.
- Hall, J. A. (1987).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 empirical review. *Adolescence*, 22(88), 767-789.
- Hayes, A. F., & Preacher, K. J. (2010). Quantifying and tes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when the constituent paths are nonlinear.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5, 627–660.
- Ho, D. Y. F. (1996). Filial pie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155–16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W. W. Norton.
-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 1–55. doi:

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Hunter, E. C., Katz, L. F., Shortt, J. W., Davis, B., Leve, C., Allen, N. B., & Sheeber, L. B. (2011). How do I feel about feelings?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families of depressed and health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 428–441.
- Hwang, K. K. (1999).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wo typ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fucian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 163–183.
- Jobe-Shields, L., Buckholdt, K. E., Parra, G. R., & Tillery, R. N. (2014). Adolescent reactions to maternal responsiveness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atology: A daily diary investig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1, 335–348.
- Joussemet, M., Landry, R., & Koestner, R. (2008).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Canadian Psychology*, 49(3), 194–200.
- Klimes-Dougan, B., Brand, A. E., Zahn-Waxler, C., Usher, B., Hastings, P. D., Kendziora, K., & Garside, R. B. (2007).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ce: Differences in sex, age and problem status. *Social Development*, 16, 326–342. doi:10.1111/j.1467-9507.2007.00387.x.
- Kline, R. B. (2016).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th ed.). NY: Guilford Publication.
- Kwan, K. L. K. (2000). Counseling Chinese peoples: Perspectives of filial piety.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7(1), 23–41.
- Laursen, B., & Collins, W. A. (2004).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 A. L. Vangelisti (Ed.),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p. 333–348). Mahwah, NJ: Erlbaum.
- Little, T. D., Cunningham, W. A., Shahar, G., & Widaman, K. F. (2002). To parcel or not to parcel: Exploring the question, weighing the meri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151–173.
- Liu, W., Chen, L., & Tu, X. (2017). Chinese adapta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RQ-CCA): A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 398–405.
- Llu, Y., Wang, Z., & Lu, W. (2013). Resilience and Affect Balance as Mediators betwee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 850–855.
- Loevinger, J. (1976). *Ego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ovibond, S.H. & Lovibond, P. F. (1995). *Manual for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2nd ed.). Sydney: Psychology Foundation.

- MacKinnon, D. P., Krull, J. L., & Lockwood, C. M. (2000). Equivalence of the mediation, confounding, and suppression effect. *Prevention Science, 1*, 173-181.
- Miklikowska, M., Duriez, B., & Soenens, B. (2011). Family roots of empathy-related characteristics: The role of perceived maternal and paternal need support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7*(5), 1342-1352.
- Miller-Slough, R. L., & Dunsmore, J. C. (2016). Parent and friend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ce: Associ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1*, 287-305.
- Noom, M., Dekovic, M. & Meeus, W. (1999) Autonomy, attachment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during adolescence: A double edged swor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2*, 771-783.
- Pinquart, M., & Srugies, D. (1998). *Influences on conflict intensity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21246).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 Rahim, M.A. & Bonoma, T.V, (1979).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A model for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44*, 1323-1344.
- Ray, R. D., Wilhelm, F. H., & Gross, J. J. (2008). All in the mind's eye? Anger rumination and reapprai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133-145.
- Sheppes, G., & Meiran, N. (2007). Better late than never? On the dynamics of online regulation of sadness using distrac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1518–1532.
- Sobel, M.E. (1982).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3*, 290–312.
- Steinberg, L. (1990). Autonomy, conflict, and harmony in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S. Feldman & G. Elliot (Eds.), *At the threshold: The developing adolescent* (pp. 255-27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eyber, E. & McClure, F. (2011).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therapy: An integrative model*. 6th Ed. Belmont, CA: Brooks/Cole.
- Webb, T. L., Miles, E., & Sheeran, P. (2012). Dealing with feeling: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 775-808.

- Wu, C. W., Guo, N. W., Hsieh, Y. S., & Yeh, K. H. (2015).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need supportive parenting on the change rate and adaptation of dual autonomy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74, 181-195.
- Yau, J., & Smetana, J. G. (1996). Adolescent-parent conflict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Child Development*, 67(3), 1262-1275.
- Yeh, K. H., & Bedford, O.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215-228.
- Yeh, K. H. (2011). Medi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arent-child conflict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236-245.
- Yeh, K. H., Tsao, W. C., & Chen, W. W. (2010).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A mediational analysis with reciprocal filial belief and perceived thre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 131-139.
- Zhao, X., Lynch, J. G., & Chen, Q. (2010).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7, 197-206.

附錄

知覺父母衝突溝通量表

1. 爸爸／媽媽會和顏悅色地與我討論問題。	sup_1
2. 爸爸／媽媽會先緩和我的心情。	sup_2
3. 爸爸／媽媽會翻出過去的舊帳指責我。	def_1
4. 爸爸／媽媽會打斷我表達自己的想法。	def_2
5. 爸爸／媽媽會把我當作懂事的大人來討論問題。	sup_3
6. 爸爸／媽媽會耐心聆聽我的想法與感受。	sup_4
7. 爸爸／媽媽會先回應我的需求而不是要求我聽話。	sup_5
8. 爸爸／媽媽會指責我不孝順。	def_3
9. 爸爸／媽媽會威脅我、用懲罰的方式要求我必須服從。	def_4
10. 爸爸／媽媽會很快的作出結論責怪我。	def_5

註：sup_#是知覺父親／母親支持性衝突溝通分量表的題項；def_#是知覺父親／母親防衛性衝突溝通分量表的題項。量尺標籤為 1=從未如此；2=偶爾如此；3=有時如此；4=經常如此；5=總是如此。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Conflict Communication on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The Differ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s Mediators

Wu, Chih-Wen¹

Yeh, Kuang-Hui^{2, 3}

Ho, Wen-Tso³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supportive and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on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i.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symptoms) in parent-child conflic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which adolescents adopt to manag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i.e., reappraisal, suppression, and proper voicing). By adop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1,104 data collected from Taiwanese adolescents (mean age = 15.96 years old, SD = 0.35 years; female account for 58.2%) who completed two questionnaires at intervals of six months, the results indicate: (1)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2)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is negatively significant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but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adolescents' mental symptoms. (3) Through reappraisal strategy as a mediato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life satisfaction but negatively significant

¹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²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³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 adolescents' mental symptoms. (4) Through proper voicing strategy as a mediato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bo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5) Through suppression strategy as a mediato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parental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i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on adolescents' mental symptoms. (6) These findings abovementioned are different in the four parent-child dyad models (i.e., father-son,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and mother-daughter). This study finally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th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al workers.

Keywords: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in conflict, parental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parental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收稿日期：2019 年 11 月 21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9 年 12 月 3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